

國強更求民富

「十二五」重切財富蛋糕

中國以「十一五」期間年均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不得不面對城鄉居民收入人均一位數的滯後增長；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富豪人數年年增長的同時，不得不面對1.5億人口尚未脫貧、普通百姓為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問題困擾的現實。「有一個富人就有五百個窮人」，溫家寶總理在談及當前收入分配不公時曾引述此語，貧富差距過大正在不斷挑戰中國社會的容忍「底線」。

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 羅洪嘯、王曉雲



溫總表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政府的良心。新華社

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如箭在弦，如何切好「財富蛋糕」將是中國民意代表們在今年兩會審議「十二五」規劃綱要時的一大焦點。3月5日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7%，大於GDP年均增長7%的預期增幅，展現了中國政府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的決心。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國民財富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10%的經濟增速令國民財富總量不斷增加，但同時分配制度不盡合理，始終是「GDP一大步，財政收入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以2010年為例，GDP增長10%，財政收入增長21%；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27%。這意味着中國經濟蛋糕過去十年做大了很多，但政府切去的份額增長更大，相對而言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有限。

不僅如此，在居民收入中也存在着分配不公的問題，基尼系數是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比例數值，據世界銀行測算，2009年中國基尼系數已攀升至0.47，突破0.4的警戒線。這意味着中國的財富已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高達20多倍。

溫總：社會公平正義是政府良心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坦承，在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情況下，確實存在着比較嚴重的貧富差距現象。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社會的公平正義，關係到社會的穩定。如果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勢必會出現大多數人的貧窮，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對此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溫家寶說，「今後五年，我們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

參與國務院「十二五」規劃綱要座談的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民眾對收入分配制度的態度，我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顯示，高達80%以上的都認為當前的收入分配存在嚴重不公，這就反映出目前國家的收入分配制度並沒有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十二五」期間，中國仍處在戰略機遇期，要想發展必須穩民心，而穩民心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縮小貧富差距。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中央高層已達成共識，並在多個場合表態要「增加報酬，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收入分配關乎勞動者尊嚴」。

百姓收入增長 超GDP目標

3月5日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7%，即超過GDP年均增長7%預期的目標。這一目標的設定，體現了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重要理念。

那麼這一目標將如何實現？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收入分配改革三大舉措：一是着力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收入；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三是大力整頓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溫總理表示，「不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讓每一個人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溫家寶矢志破解收入分配難題的肺腑之言讓人動容。他說：「提高全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政府的良心。」未來五年，中國能否扭轉收入分配失衡、不公的勢頭，中國民眾將拭目以俟。

不觸及既得利益 風險更大

做大「蛋糕」容易，但是改變切「蛋糕」的規則面臨不小阻力。王小魯向香港文匯報坦陳，改革會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反對，也要冒引發某些衝突的風險，但最大的風險來自不改革，不觸及既得利益，結果可能導致更大的風險。

李實直言，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政府在處理此問題上處於兩難境地。政府要大刀闊斧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可能會引發負面作用，引起部分利益集團的反彈。

收入分配是社會「體溫計」

李實指出，收入分配公正與否是衡量社會的體溫計，不程度越來越高，整個社會就有可能發高燒，大多數老百姓不滿意，社會就會不穩定。因此不論從維持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還是實現和諧社會目的，都應該更加重視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解決。



貧富差距過大正在不斷挑戰中國社會的容忍「底線」。圖為在北京街頭賣藝的盲人和孩子。

政府應少取多予 善用分配調節



專家呼籲政府對低收入、貧困家庭採取更大的扶持措施，包括協助解決兒童上學。

中國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已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埋下了隱患。專家建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政府少取多予，短期最為有效的手段還是應在稅收和轉移支付等二次收入上下功夫，通過減稅和加大對社保、教育、醫療等民生支出的投入，實現讓利於民和藏富於民。

六大主因 導致分配不均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不是某一問題作用的結果，而是多種原因導致的：一、政府與民爭利；二、官員腐敗、政府消費過高；三、政府沒有真正擔負起公共服務責任；四、壟斷性收入分配不合理；五、稅收制度不健全，稅負不均；六、公共服務不到

位，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面的財稅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

在這種局面下，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建議，短期較為奏效的辦法是將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放在二次分配上。通過徵稅，讓有錢人多繳稅，政府收稅後再通過支付轉移窮人受惠。對政府「少取多予」的理解，並不是簡單地讓政府要壓縮行政開支，而是讓政府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更多的投向民生，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李實指出，目前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很快，在這種有利情況下，應該把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來，讓所有的人群都能享受到社會保障。對於低收入、貧困家庭，政府可採取更大的扶持措施，包括協助解決小孩上學，給予家庭基本生活補助。此外，對一些學歷較低、低於技術標準的勞動力，特別是農民工，要增加培訓並給予更多的就業機會。政府增加了公共服務的投入，意味著民眾自掏腰包看病上學的花費將減少，即便民眾的收入並沒有太大幅度的增加，讓民眾少花錢也是一種收入分配調節的方式。

初次分配調整 突破口在「稅」

至於初次分配的調整，專家們認為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其突破口將是一個「稅」字。社

科院此前發佈報告認為，中國個稅體制的主要弊端是工薪收入者的稅負重，其他人員的稅負輕；對工薪收入者的徵管嚴，對其他收入者徵管鬆。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指出，對那些勞動密集型的、經營利潤微薄的、安排大量勞動者就業的中小企業，要進一步減免稅費，讓他們有能力維持企業的生存發展，有能力給職工增加工資。同時，要改進完善個人所得稅，讓暴富的過高收入者和其他高收入者多交稅，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特別是要從財政收入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用於民生、社保和轉移支付，更好地保障低收入居民包括低收入行業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從而縮小收入差距。



專家表示，使民眾自掏腰包看病上學的花費減少，也是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方式。

「隔行如隔山」 薪水差百倍



上海的「免費就業培訓」報名點吸引不少找工作的人。



中國個稅體制的弊端是對工薪收入者的徵稅重徵管嚴，對其他收入者徵稅輕徵管鬆。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日漸懸殊，呈現「洋蔥型」或「倒丁字型」結構，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這種收入結構給社會穩定構成巨大威脅。除經濟發展轉型外，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將面臨社會結構轉型的重大難題：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擴大中產階層，令社會結構向「橄欖形」轉變。

中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新發佈報告顯示，2008年金融業工資最高的是證券業，與工資最低的畜牧業相比，差距為15倍。國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會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內地電力、電信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而實際收入差距達5-10倍。

國企、壟斷行業高收入現象飽受詬病，作為國有企業監管部門的國資委率先啟動降薪計劃。早在2008年國資委就開始工資總額預算管理制度試點，2009年央企盈利排名第一的中移動宣佈「降薪令」，2010年資產排名第二的國家電網也啟動

降薪計劃，降幅最高達到整體工資的30%。可是，作為高收入行業的金融業薪酬依然「高高在上」。來自國家統計數據庫的數據顯示，2007年，金融業以49,435元位居各行業收入榜首。2009年年報數據顯示，少數國有金融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

國企金融業 收入畸高因壟斷

對此，李實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國企、金融業收入畸高，根本原因在於壟斷，問題出在利潤的分配方式和管理辦法。要縮小國企、金融業與其它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打破壟斷，一些行業短期內不可能做到，但是可以對利潤分配、高管薪酬管理、職工工資分配採取明確、合理的調控手段。

同時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溫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步提高職工最低工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不少地方政府已付諸實施。蘇、粵、晉、湘、魯等10餘省市在地方「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均提出了居民收入倍增計劃。